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转型中的中国经济： 从外部到内部的再平衡



阿诺普·辛格 马尔哈·纳巴 帕帕·恩迪亚耶
主编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转型中的中国经济：

从外部到内部的再平衡

阿诺普·辛格 (Anoop Singh)

马尔哈·纳巴 (Malhar Nabar) 主编

帕帕·恩迪亚耶 (Papa N'Diaye)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China's Economy in Transition: From External to Internal Rebalancing
Copyright © 201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ranslation by the China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2015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oes not accept an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ies, the original language shall govern.

《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从外部到内部的再平衡》

版权© 201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组织翻译。

本翻译作品经授权出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该翻译作品的准确性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存在差异，一律以英文原版为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从外部到内部的再平衡 / (印) 阿诺普·辛格, (美) 马尔哈·纳巴, (法) 帕帕·恩迪亚耶主编; 庄玲丽译.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095 - 7215 - 3

I. ①转… II. ①阿… ②马… ③帕… ④庄… III. ①中国经济 - 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0792 号

责任编辑: 罗亚洪 孙 腾
封面设计: 孙佰铭

责任校对: 黄亚青
版式设计: 录文通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840413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10 × 1 000 毫米 16 开 17.75 印张 256 000 字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7215 - 3

图字: 01 - 2017 - 0338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 - 88190414 QQ: 447268889

致 谢

特此感谢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地区工作并对本书章节构成提供帮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同仁，特别要感谢史蒂夫·巴奈特（Steve Barnett）、奈杰尔·查克（Nigel Chalk）和马库斯·罗德劳尔（Markus Rodlauer）等几位同事。在中国、亚洲其他地区以及美国华盛顿工作的 IMF 官员和分析员的讨论也对本书的分析带来了帮助。

我们还要感谢艾梅尔·余（Imel Yu）和阿拉·密尔维达（Alla Myrvoda）协助汇集书稿内容，感谢乔·普罗科皮奥（Joe Procopio）编辑并整理书稿。

本书中呈现的观点以及出现错误均由作者负责，并不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他工作人员、亚洲各国及地方政府、执行董事和管理部门的观点。

编写人员

阿什文·阿胡加（Ashvin Ahuja）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 IMF）亚太部的高级经济学家并曾率代表团至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他于 2010~2012 年负责 IMF 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在 2010 年加入 IMF 之前，阿胡加先生就职于泰国银行。他拥有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拉维·巴拉科瑞斯南（Ravi Balakrishnan）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自加入 IMF 以来，他已经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工作过，在就任现职前，暨 IMF 新加坡驻地代表，还在《世界经济展望》编辑部工作过。他的政策主张研究兴趣和涉及劳工和职业动态、通货膨胀动态、汇率动态和资本流动、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他的研究已经在《欧洲经济评论》、《国际货币和金融期刊》以及《IMF 文集》中发表。

史蒂夫·巴奈特（Steve Barnett）是 IMF 亚太部总监。他在过去 1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负责亚洲事务，包括担任 IMF 亚太部东京办事处的助理主任、中国驻地代表和泰国驻地代表。在 1997 年加入 IMF 之前，他曾获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及关于俄罗斯和东欧研究的硕士学位。

奈杰尔·查克（Nigel Chalk）为 IMF 亚太部的副主任，并在 2008 年到 2011 年间率 IMF 代表团至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此之前，他曾在俄罗斯、韩国、巴西和阿根廷等新型市场国家工作。他拥有伦敦经济学院的硕士学位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米塔利·达斯（Mitali Das）是 IMF 研究部的一名高级经济学家。在入职 IMF 前，达斯女士于 1998~2006 年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于 2006~2009 年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在 IMF，她就职于研究部的开放型经济宏观经济学和多边监督部门。她于 1998 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耿楠 (Nan Geng) 是 IMF 欧洲部门的经济学家。自从加入 IMF 后, 她曾从事于对亚洲包括中国和欧洲的经济研究, 在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汇率统一、去杠杆化和信贷增长、溢出以及财政调整和债务可持续性研究方面多有建树。Geng (耿) 女士, 汉族, 拥有加州圣克鲁兹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李一衡 (Il Houn Lee) 2010 ~ 2013 年曾担任 IMF 驻中国北京首席代表。李先生在 1989 年通过经济学家计划加入 IMF。此后, 他已经在多个部门工作过, 并在日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多个亚洲经济体中任过职。来中国之前, 他担任亚太部顾问和菲律宾使团团团长。李先生拥有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和英国华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在华威大学和越南国家经济大学任教。

刘雪雁 (Liu Xueyan) 在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宏观经济研究院担任高级研究员。刘女士拥有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其为 IMF 北京办事处的访问学者期间, 她与驻中国代表李一衡 (Il Houn Lee)、司马喆 (Murtaza Syed) 合著书稿, 为此书的出版作出了贡献。

阿拉·密尔维达 (Alla Myrvoda) 是 IMF 亚太部的研究分析员, 研究范围覆盖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省。在 2011 年加入 IMF 之前, 密尔维达女士曾在城市研究所任职。她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

马尔哈·纳巴 (Malhar Nabar) 在 IMF 亚太部担任高级经济学家, 研究范围覆盖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他之前任职于亚太区地区研究部门。他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金融发展、投资和生产力增长。在 2009 年加入 IMF 之前, 纳巴先生任职于韦尔斯利学院的经济系。他拥有布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帕帕·恩迪亚耶 (Papa N'Diaye) 是 IMF 战略、政策和评估部的副总监。此前, 恩迪亚耶曾在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工作。他曾就读于巴黎索邦大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专业, 并在巴黎第九大学为本科学学生讲授宏观经济学。恩迪亚耶先生已就多项课题发表了众多作品, 内容涉及货币政策、资产价格、宏观审慎政策、财政政策以及中国的再平衡增长。

内森·波特 (Nathan Porter) 在 IMF 战略、政策和评估部担任副总监。他在之前曾任职于亚太部, 负责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相关事务。波特先生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马库斯·罗德劳尔 (Markus Rodlauer) 为 IMF 亚太部的副主任, 2012 年和 2013 年曾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条款磋商”团队的负责人。他之前曾担任西半球部的副主任、亚洲部的助理主任以及波兰和菲律宾的 IMF 驻地代表。罗德劳尔先生在加入 IMF 之前曾在奥地利外交部工作。学术经历方面, 他取得了法律、经济和国际关系的相关学位。

阿诺普·辛格 (Anoop Singh) 从 2008 年 9 月开始担任 IMF 亚太部主任。在此之前, 辛格先生为西半球部门主任。辛格先生为印度人, 拥有孟买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他在 IMF 的其他任职包括总裁办公室特别业务主任、政策发展和评估部高级顾问、欧洲部助理主任和 IMF 驻斯里兰卡代表。他还曾是印度储备银行行长的特别顾问 (I. G. 帕特和曼莫汉·辛格)、世界银行亚洲区副总裁的高级经济顾问、乔治城大学的副教授以及孟买大学讲师。辛格先生曾从事宏观经济、监督和危机管理等问题研究并有相关著作, 帮助设计针对南亚和东南亚、东欧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转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 IMF 支持项目。他曾带领使团到访过很多国家, 如在亚洲危机时期, 访问过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在越南、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转型早期, 也到访过; 还到访过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和菲律宾在内的一些其他亚洲和美洲国家。

查德·斯坦伯格 (Chad Steinberg) 是 IMF 战略、政策和评估部的高级经济学家。他在 2002 年加入 IMF 并于 2008 年到 2012 年期间就职于 IMF 亚太地区东京办事处。他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和劳工市场。他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司马喆 (Murtaza Syed) 是 IMF 驻中国副代表。他之前已经负责诸多亚洲经济体事务, 包括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老挝。他还曾参与 IMF 在亚洲的地区监督以及相关的多米尼加和缅甸的项目。他的研究方向包括贸易、投资、不均等、财政可持续性和金融溢出。司马先生曾获得牛津大学 (纳菲尔德学院) 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入 IMF 前, 他曾就职于伦敦的财政研究所和伊斯兰堡的联合国开发计划项目资助的人类发展中心。

奥拉夫·罗伯多尔斯特 (Olaf Unteroberdoerster) 担任 IMF 亚太区地区研究部门的副总监。他的研究方向包括国际贸易、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以及经济再平衡。他目前担任 IMF 赴柬埔寨代表团团长,

并于 2007 年至 2009 年期间，担任 IMF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在 1998 年加入 IMF 之前，安特罗伯多尔斯特先生曾在位于东京的一桥大学和联合国大学担任访问研究员。他曾在德国、法国和美国从事经济和商业管理研究，并获得布兰迪斯大学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学博士学位。

缩 写

BVAR	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
CD	存款单
DOTS	《世界贸易统计年鉴》
FAI	固定资产投资
FAVAR	因子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
FDI	外国直接投资
G7	七国集团
G20	二十国集团
GIMF	全球综合货币和财政模型
LTP	刘易斯拐点
NAIRU	非加速型通货膨胀失业率
NIE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OLS	普通最小二乘法
PBC	中国人民银行
PPP	购买力平价
REER	实际有效汇率
SAR	特别行政区
TFP	全要素生产率
UN	联合国
WEO	《世界经济展望》
WTO	世界贸易组织

引言与概述

阿诺普·辛格 (Anoop Singh)、马尔哈·纳巴 (Malhar Nabar) 和
帕帕·恩迪亚耶 (Papa N'Diaye)*

当中国于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时, 中国经济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加入 WTO 之前, 中国也由内向型计划经济转向外向型市场主导型经济。这一转变使中国晋升到世界十大出口国之列。成为 WTO 的成员国之后, 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发展顺理成章, 但是, 中国跻身世界前列的速度之快仍然让人震惊。下面的比较有助于客观看待这种增长, 2001 年中国的出口额是日本的 $\frac{3}{4}$, 是德国的 $\frac{1}{2}$, 是美国的 $\frac{1}{3}$; 2003 年, 中国已经赶超日本, 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 2006 年, 中国超过美国, 跻身世界第二大出口国; 2008 年, 中国出口额超过彼时最大的出口国德国。

入世余波中的外部失衡

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出口产品在全球市场中急速增长, 这也表明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外部需求。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一部分, 中国出口额从 2001 年的 20% 增长到了 2007 年的 35%, 相比 20 世纪 90 年代, 现在的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净贡献率已翻番; 同时, 中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盈余引起的外部失衡已经由 2001 年占 GDP 的 1.25% 增长到 2007 年占 GDP 的 10%。

在中国外向型经济飞速发展的这几年间, 分析家们开始担心在全球失衡加剧背景下中国经常性账户规模的日益扩大而全球失衡主要是由于为美国外部赤字提供资金, 同时伴随的是东亚、德国和石油生产国的盈余增加^①。问题是, 这种巨大的失衡是无法持续的, 一旦投资者开始对为美国外部赤字提供资金表现出谨慎态度, 这种失衡

* 除篇(章)名下的作者, 全书中的人名基本沿用英文原名, 以利于检索。

① 参见 Obstfeld 和 Rogoff, 2005; Roubini 和 Setser, 2005。

就会以无序的状态呈现出来。然后，高启的借款成本会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那些依赖美国需求的新兴市场就会遭遇经济崩溃和失业率增长^①，甚至表面看起来势不可挡的中国经济也不能独善其身。基于这种背景，中国的领导层公开承认对经济增长模式的关注^②。

正如突然出现的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已显现的收缩迹象也显得很突然。中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盈余从2007年占GDP总额高于10%的峰值降至2011年占GDP总额低于2%。专家曾预言，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活动紧缩是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造成的，而不是广义上的美元标价的有色证券的崩溃造成的。经济顺差收缩的诱发因素与上述专家预言有所不同。作为GDP的一部分，中国的出口份额在2011年降至26%。因过去四年中有两年是全球金融危机时段，中国的净外部需求减缓了其经济增长。引人注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中国当局强有力的政策响应，中国经济每年以高于9%的速度持续增长。

中国外部失衡的减弱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前景，即国内增长引擎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首先，这符合中国经济的最大利益，使其巨大的制造能力能够在国内部署，并减少对不确定的外部需求的依赖性，确保可持续发展。其次，随着中国为其他国家的出口提供稳步扩大的市场，这种转变将置世界经济于一种更坚固的基础上，这也帮助弥补一些发达经济体的需求疲软。考虑到中国对稳定的、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正在进行的转型会到何种程度。更具体地说，中国经常性账户的收缩是否是在经济增长不依赖出口和投资因素而依靠消费驱动的、持续性的转变？

① 该下行预测是在IMF 2006年多边磋商会议上提出的。会上，最大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盈余国和赤字国（中国、欧元区、日本、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作出承诺，将通过体制改革、财政整顿和加大汇率弹性等共享性战略来减轻全球经济失衡。

② 参见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内容，http://www.china.org.cn/200714/2007-03/16/content_1203204.htm。温家宝总理承认：“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这导致了发展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所谓不稳定，就是指投资增长率过高，信贷投放过多，货币流动性过大，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所谓不平衡，就是指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发展不平衡。所谓不协调，就是指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不协调，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和外贸出口。所谓不可持续，就是指我们还没能很好地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而且是需要长期努力的问题。”

外部失衡减弱而内部失衡加剧

本书收录了IMF职员关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再平衡的最新研究。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盈余减少至危机前峰值的近1/5,这无疑大大缓解了外部失衡,并且政策的加持对将经济发展调整到依靠国内需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时至今日,对外顺差减少了,而基于消费的经济增长并没伴随而至。反而,通过国民经济的一分子——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对外盈余减少的部分得到了补充。对投资的持续依赖引发了问题:对外盈余的收缩到底能持续多久,现存的增长模式虽然在过去三十年间帮助5亿人民摆脱贫困并取得空前成功,但其是否能持续?简言之,当外部失衡表现为正在减弱时,内部失衡似乎仍呈上升趋势。这一形势的变化带来了诸多危险,如持续性产能过剩、通货紧缩压力和巨额经济损失。另一种可能,如果国内消费需求增加没有如期而至,那么中国企业将冒着压低价格和诱发报复性贸易活动的风险,把剩余生产力转投到国际市场。

本书分析涵盖三个主题:中国经常性账户盈余减少的原因和内部失衡加剧的迹象;对中国贸易伙伴的意义;在持续观察直至形成稳定、可持续和包容性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过程中的政策教训。第一部分,在全球经济失衡和自2007年来导致盈余骤减的因素的大背景下综述中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盈余的情况。毋庸置疑,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随后缓慢的复苏,收缩的外部失衡会受到外部需求崩溃的直接影响。但是其他因素看似也起到一些作用,包括贸易条件指数的变化、人民币的逐渐升值、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新领域产能投资的阶梯式增长。

第一部分其他章节考察内部失衡加剧的不同维度。第二章至第四章重点是投资。探讨中重要的是区别存量资本和投资流动。这些章节发现,尽管中国资本产出比率与其他新兴市场的比率处在同一范围内,但依据多种衡量标准其投资回报仍显过高。按部门分析显示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基础建设行业是近几年投资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和资本的积累意味着产能已远大于最终需求,在已经过去的2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产能过剩的。

第五章从更多细节上探究了家庭储蓄和消费。在中国城市中,居民生活在一个快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购房欲望膨胀的环

境下，他们大多采取自我保险的方式来缓冲薪资波动和健康状况起伏带来的问题。存款收益率的下降会导致人们将可支配收入更多地用于存储以达到储蓄目标。因此，关键之处在于储蓄回报的增长将使居民更容易达到储蓄目标并抑制高储蓄倾向。

对贸易伙伴的影响

本书的第二部分探究中国内部失衡的加剧对其他经济体带来的潜在结果。第六章和第七章分析了中国外部再平衡和投资倾向对贸易伙伴造成的影响。如果内部失衡将会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受益于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的那些经济体的出口可能会受到影响，特别是相对而言经济结构较简单的地区供应链经济体和商品出口国最容易受到中国投资减缓的影响。中国的投资溢出效应也将会强势席卷二十国集团贸易伙伴的一系列的宏观经济、贸易和金融变量，尤其是德国和日本。

第八章中所考察的相关问题则是房地产投资活动对贸易伙伴更加具体的影响以及房地产行业无秩序调整所带来的潜在后果。房地产投资约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 1/4。中国房地产投资的突然下滑将会对中国的整体活动造成显著影响，也会对商品价格和中国在二十国集团内的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溢出效应。二十国集团中的机械和商品出国商将会最大限度地受到中国房地产调整活动的影响。

政策意义

本书的最后部分探究了为确保中国向以消费为基础并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模式的转变所需采取的措施。第九章通过人口状况找到了改革动因。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发展奇迹与出口导向型加工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迅速发展息息相关。虽然中国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预期在 2020 年前不会到达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供应过剩将会结束的节点），但时不待我。届时，现有架构就可以通过相对较低的调整成本进行改良。

本次调整的关键部分是要让增长更具有包容性。从 2000 年起，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并且各省份间的薪酬差距也已增大。

第十章考察了促进中国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关键之处是存在空间以加大医疗教育支出以及通过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机能来扩大增长效益。更宽泛的是，加强增长的包容性和加大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必将瓦解进入各类行业的壁垒。正如第十一章内容所示，消除上述壁垒对服务与国内导向型产业具有重大意义。鼓励新企业进入和提高可竞争性会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大幅提升中国的人均收入。

中国在作出上述调整时所面临的挑战类似于该区域内其他经济体在过去数十年里遇到的挑战。第十二章深刻剖析了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经验和中国类似转型可能面对的潜在阻碍。日本在诸多方面提供了教训，如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的局限性、针对非贸易行业经济再平衡的囊括宏观经济、结构化的和汇率的混合政策的失调以及金融行业在结构改变中扮演角色的失误。

有关金融自由化的见解与中国发展的当前阶段特别相关。金融业改革，尤其是放松利率管制和持续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将会降低投资并有助于向个人消费带动增长的模式转变。如第十三章关注的，推迟金融自由化或者同时在多方面推行改革，可能会对中国造成诸多风险。反之，在后五年内若按照明确规划次序推进改革，将会有助于扩大整体经济的就业机会，帮助提升生活水平，以及在保持稳定强势增长的同时，允许中国针对个人消费的经济再平衡。

国内再平衡过程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利害关系。2011 年，中国成为世界消费增长的最大贡献国（Barnett, Myrvoda 和 Nabar, 2012），展现出其作为最后需求动力的潜能。但是在全球消费比重中的大幅增长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快于其他经济体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缘于作为中国国民经济中一部分的居民消费的显著增长。就像书中所指出的，可从多方面再平衡中国的增长模式，即经济增长从依赖出口和投资转向依靠个人消费。解决了上述各个方面的问题将会使中国的增长更加稳定、更可持续，甚至更具包容性。反过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上述发展成果将会实质上提升全球经济的中期展望。

参考文献

- Barnett, S., A. Myrvoda, and M. Nabar, 2012, "Sino-Spending,"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9, No. 3 (September).
- Obstfeld, M., and K. Rogoff, 2005, "Global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and Exchange Rate Adjustment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1, pp. 67–123.
- Roubini, N., and B. Setser, 2005, "Will the Bretton Woods 2 Regime Unravel Soon? The Risk of a Hard Landing in 2005–2006,"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A New Paradigm for Asian Development?" organiz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an Francisco, February 4.

目 录

致谢	iii
编写人员	v
缩写	ix
引言与概述	1
 第一部分 焦点转移：从外部到内部的失衡	
第一章 中国失衡的终结?	9
阿什文·阿胡加 (Ashvin Ahuja)、奈杰尔·查克 (Nigel Chalk)、马尔哈·纳巴 (Malhar Nabar)、 帕帕·恩迪亚耶 (Papa N'Diaye) 和内森·波特 (Nathan Porter)	
第二章 中国的投资：过犹不及?	30
李一衡 (Il HOUNG Lee)、司马喆 (Murtaza Syed) 和 刘雪雁 (Liu Xueyan)	
第三章 中国的快速投资、潜在产出及产出差距	46
帕帕·恩迪亚耶 (Papa N'Diaye) 和史蒂夫·巴奈特 (Steve Barnett)	
第四章 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决定因素：源于跨国企业面板数据 的证据	55
耿楠 (Nan Geng) 和帕帕·恩迪亚耶 (Papa N'Diaye)	
第五章 中国城市的利率、投放和家庭储蓄	81
马尔哈·纳巴 (Malhar Nabar)	

第二部分 对中国贸易伙伴的意义

第六章	中国再平衡对亚洲的意义	109
	奥拉夫·安特罗伯多尔斯特 (Olaf Unteroberdoerster)	
第七章	中国投资导向型增长：全球溢出	118
	阿什文·阿胡加 (Ashvin Ahuja) 和马尔哈·纳巴 (Malhar Nabar)	
第八章	中国房地产投资衰退的溢出效应	139
	阿什文·阿胡加 (Ashvin Ahuja) 和阿拉·密尔维达 (Alla Myrvoda)	

第三部分 政策意义

第九章	衰退预言实录：中国是否已达“刘易斯拐点”？	159
	米塔利·达斯 (Mitali Das) 和帕帕·恩迪亚耶 (Papa N'Diaye)	
第十章	从国际视角看中国的减贫式和包容性增长	182
	拉维·巴拉科瑞斯南 (Ravi Balakrishnan)、查德· 斯坦伯格 (Chad Steinberg) 和司马喆 (Murtaza Syed)	
第十一章	消除垄断以实现中国的长期繁荣	203
	阿什文·阿胡加 (Ashvin Ahuja)	
第十二章	转型中国：从日本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历中得出的 见解	218
	帕帕·恩迪亚耶 (Papa N'Diaye)	
第十三章	下一个大爆炸：中国金融改革路线图	243
	奈杰尔·查克 (Nigel Chalk) 和司马喆 (Murtaza Syed)	
第十四章	总结	268
	马库斯·罗德劳尔 (Markus Rodlauer)	